

跨户籍婚姻与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

——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孙楠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本地身份认同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2017年数据为基础,按照户籍属地的异质性定义了跨户籍婚姻,考察了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婚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性别、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和本地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存在积极影响,分城乡来看,这种影响在乡-城流动人口中更加明显。性别和人力资本对此影响具有调节作用。跨户籍婚姻对于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在女性流动人口群体中更为强烈;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跨户籍婚姻对其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越小。本地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在跨户籍婚姻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跨户籍婚姻; 流动人口; 身份认同; 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68(2022)03-0042-10

Inter – Hukou Marriage and Local Identity of Internal Migra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SUN N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n 2017, and defines “inter – Hukou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Hukou registr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ter – Hukou marriage on migrants’ loc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rol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cal social capital. It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inter – Hukou marriage on the local identity of migrants is widespread. Such influence is more obvious in rural – urban migrants.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is effect,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mong female migrants.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the higher an individual’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les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ter – Hukou marriage on one’s local identity. In addition, local social capital plays a certain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influence of inter – Hukou marriage.

Key words: Inter – Hukou marriage; Migrant; Identity; Social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20-06-27; 修订日期: 2021-03-14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技创新计划重大项目(E00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楠(1994—),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1 研究背景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流动过程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包括居住、就业、行为模式、社会网络等一系列要素都面临在流入地的重构(蔡禾,曹志刚 2009)。在此过程中要如何回答“我是谁”就是流动人口所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寻找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群体无一例外要经历的过程。它“是行动者获取意义的源泉”(卢晖临,潘毅 2014),并引发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应(邓睿 2019;周明宝 2004)。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这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许多研究探讨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张文宏,雷开春 2008;杨菊华等 2016;史毅 2016)。这些因素在微观层面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特征,就家庭特征而言,诸多文献着重考察了家庭化迁移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褚清华,杨云彦 2014;王春超,张呈磊 2017),但从婚姻角度予以关注的研究较少。

人口流动范围扩大和流动规模增加导致通婚圈拓展(张翼,尹木子 2017),在此过程中一些流动人口于流入地结识配偶并随之结婚安家,呈现出婚姻的跨户籍性。在农村到城市为人口流动主导方向的阶段,这种跨户籍婚姻主要表现为城乡通婚,反映出户籍类型的差异。但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弱化,以及城-城流动人口增加,跨户籍婚姻更普遍体现为跨越户籍属地,即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结合。从“城乡之别”到“内外之分”,折射出我国户籍改革的现实进程(Felicia F. Tiana et al. 2018)。2014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①,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旨在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公共福利水平,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逐渐削弱户籍类型特殊性的同时,户籍属地在引导和管理属地内流动人口方面的作用却在强化。由于地方政府更多地对与户籍属地相关的政策负责,包括制定落户标准和确定本地户籍福利待遇的自主权,户籍属地决定了人们能否在特定的城市享受当地的福利和社会服务。这种本地人与外地人结合的婚姻模式会对个人及家庭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便是顺应而生的问题。另一方面,通婚是国外社会融入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发现跨族群婚姻不仅反映出社会融入的程度,也对少数族裔或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而在国内研究中,基于户籍属地的异质性,一些文献关注了这种跨户籍婚姻的现状、演变(高颖,张秀兰 2014;赵晔琴等 2016),但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所产生的影响尚缺乏研究,而这也正是本文期待回答的问题。

本文将“跨户籍婚姻”定义为本地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结合的婚姻模式,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就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行定量考察。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米尔顿·戈登在其经典同化论中,系统性划分了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包括文化融入、结构性整合、通婚、身份认同、态度认同、行为接受和公民性同化七个层面(Milton Gordon, 1964)。通婚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间交往增强的结果,另一方面继续促进移民心理层面的融入。尽管一些国外研究认为,跨族群婚姻与社会融入的关系并非那么绝对(Chow 2000; Song 2007),但这主要是由于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就国内情况而言,与本地人结婚仍然是流动人口实现非制度性社会融入的快速通道(靳小怡 2016)。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个体在人际交往互动中获得特定的社会身份角色并据此形成自我观念,由此产生身份认同(Hogg et al. 2010)。从本质上来看,这种人际交往互动就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密切的交往互动有助于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源量,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李斌,张贵生 2019)。有学者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越广泛,越有利于消除群体偏见和改变身份认同(王桂新,武俊奎 2011)。这也正是理解从跨户籍婚姻到本地身份认同这一跨越的关键。

^①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014年7月30日。

跨户籍婚姻促进了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成员建立关联,参与各种活动,进入本地机构(Uzi Rebhun, 2015),成为其本地社会资本的来源。首先,与本地人结婚的流动人口更可能进入本土生活空间,通过打破居住隔离增加和丰富流动者本地化的生活体验,减少所感知到的社会排斥。正如有研究发现以本地人为主的邻里构成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祝仲坤,冷晨昕,2018);第二,通过跨户籍婚姻,流动人口进入本地家庭并成为其中一员,得以分享配偶及其家庭的本地资源与网络(Ryan & Mulholland, 2013; Koelet et al., 2017)。此外,配偶的本地户籍属性以及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削减制度隔阂带给流动人口的心理距离。对于非法移民来说,婚姻制度更是合法化其自身或子女公民身份的手段之一(Passel & Taylor, 2010)。而这种后致性的社会资本在许多研究中被发现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增强其本地归属感(悦中山等,2011;任远,陶力,2012)。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跨户籍婚姻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假设2:本地社会资本在跨户籍婚姻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跨户籍婚姻为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通道,然而,个体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婚姻进行社会资本积累和实现本地身份认同,或者说流动人口对于本地配偶依附程度的强弱,实际上与个体客观的社会融入能力密切相关。比如景晓芬,李松柏(2013)发现,一些客观条件较差,通过婚姻迁移实现从“低”到“高”流动的农村女性,当迁入地的环境优于自己以前所处的环境,更容易形成“自己属于这里”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当个体自身的社会融入能力较差,需要借助婚姻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程度就会增强。这种客观能力主要由人力资本水平反映。大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情况越好(Wang et al., 2018; 刘涛等,2020; 杨菊华,张娇娇,2016)。良好的受教育水平使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具备更大的优势,并突出反映在就业市场。比如有研究发现,就业质量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影响其城市融入的中介变量(李强,何龙斌,2016);教育也是扩展社会网络的有力手段,并正向影响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杨菊华等,2013),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更可能与流入地市民交往(李树茁等,2008);从政策层面来看,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更是将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落户直接挂钩。在这种宏观政策的影响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受到的社会排斥越少,越有能力适应新环境,提高社会资本积累(杜鹃等,2005),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提高,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会弱化。

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了跨户籍婚姻的社会效应,但现有研究多着眼于跨户籍婚姻中的女性群体,即“外来媳妇”。一是由于“从夫居”的传统,女性更容易成为迁移的那一方;二是在“流动者”与“外来者”的双重身份下,这些流动女性更可能处于“他者”边缘(谭琳等,2003)。由此可见,跨户籍婚姻带给流动人口的是一种性别化的生活体验,那么跨户籍婚姻对其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之间一种不对称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差异,通过在文化场所中的建构,形成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凯特·米莉特,1999)。女性在两性权利关系中被建构为从属的一方,强调其身依附者的角色。比如在农村社会,女性婚后往往须依附于丈夫获得在亲属体系和家族村落体制中的正式地位(杨华,2018)。对于农村女性来说,婚姻更是其获取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韦艳,蔡文祯,2014)。与本地已婚女性相比,婚姻迁移女性在经济、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福利等方面呈现出优越性(韦艳等,2014)。阶层认知的相关研究也发现,“通过配偶而与生产资料建立的联系”,在女性的自身阶层地位感知中以间接的阶级位置发挥作用(许琪,熊略宏,2016)。另一方面,被嵌入性别意涵的文化结构形塑着两性的资源、机会、行为和心理等方面(刘爱玉等,2015),一定程度上这解释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相对弱势地位。虽然流动经历在一些研究中被发现有有助于女性的赋权增能(邱幼云,2017),但相对来说,流动女性在就业机会、就业稳定性、工资收入、社会参与等多方面仍然处于劣势(罗俊峰,童玉芬,2015;吴际等,2017),相对男性,她们的社会融入渠道更为单一(向华丽,2013),这都有可能强化流动女性在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对于婚姻的

依附。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 相对男性, 跨户籍婚姻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3 数据、变量和方法

3.1 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调查样本为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区、市) 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样地区居住超过一个月而非当地户口的人口。由于本文关键自变量为配偶户籍性质, 并以此界定样本的婚姻模式是否属于跨户籍婚姻, 因此只保留初婚、处于劳动年龄(16 - 59 周岁) 的样本。对年龄进行限制是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限定在劳动年龄内可以排除退休等因素对于分析的干扰。在筛选样本记录后, 最终得到 120 901 个有效研究样本。

3.2 变量

因变量: 本地身份认同。通过问卷中“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来反映, “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取值为“1”, “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取值为“0”, 该变量为二分变量。

自变量: 跨户籍婚姻。本文中的“跨户籍婚姻”定义为本地户籍人口与外地流动人口结合的婚姻模式。由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所针对的样本群体均为流动人口, 因此只需样本配偶是否本地户籍这个信息就可以判定该样本的婚姻是否属于跨户籍婚姻。配偶为本地户籍人口时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该变量为二分变量。

控制变量则依据已有研究所发现的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因素而选取。具体包括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性别、年龄、户籍性质、健康状况、工作状况、子女数量; 还包括流动特征: 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流动经历; 以及住房性质、是否办理居住证、是否拥有社保卡、是否购买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此外还将流入、流出地区域处理为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就本文所关注的本地社会资本变量, 参照相关文献(任远, 陶力, 2012) , 本文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社会交往, 二是社会参与。前者通过“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反映, 选择“本地人口”视为 1, 其他视为“0”; 后者通过过去一年在本地参加过工会活动/志愿者协会活动/同学会活动/老乡会活动/家乡商会活动/其他活动的总量来反映, 参加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加总后按连续型变量处理。

3.3 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研究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身份认同”是二分类变量, 建立模型如下:

$$Pr\{ identity = 1 | X \} = \Phi(\beta_0 + \beta_1 marriage + \beta_2 Adjust + \beta_3 Control + \mu)$$

其中 $identity$ 是因变量, 表示身份认同; $marriage$ 是自变量, 表示跨户籍婚姻; $Adjust$ 和 $Control$ 分别代表前文所指出的调节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 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值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方法尝试提高估计的精准性。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统计

表 1 展示了变量设置情况及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研究样本实现了本地身份认同的占比为 77% , 9% 属于跨户籍婚姻。样本性别分布较为均匀, 平均年龄为 37.34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87 年, 从户口性质来看, 绝大部分样本来自农村(79%)。图 1 进一步列出了总体、分性别和户籍的跨户籍婚姻与本地身份认同情况。首先, 女性样本中实现跨户籍婚姻的比例(10.4%) 要高于男性(7.18%) , 城镇流动人口(15.83%) 实现跨户籍婚姻的比例高于农村人口(6.87%) ; 从认同本地身份的比例来看, 男性(76.81%) 和女性(76.37%) 之间差异较小, 城镇流动人口(82.16%) 认同本地身份的比例要高于农村流动人口(75.12%)。进一步与跨户籍婚姻样本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比例做比较发现, 无论是总体还是分性别、户籍来看, 跨户籍婚姻样本认可本地身份的比例都要更高。

表1 变量及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本地身份认同	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1; 否则=0	0.77	0.42
跨户籍婚姻	配偶是本地户籍人口=1; 否则=0	0.09	0.28
性别	男性=1; 女性=0	0.51	0.50
受教育水平 ^①	连续型变量(0-19)	9.87	3.18
年龄	连续型变量(16-59)	37.34	8.71
户籍性质	非农业=1; 否则=0	0.21	0.41
健康状况	健康=1; 否则=0	0.98	0.15
劳动参与	从事有酬劳动=1; 否则=0	0.83	0.37
子女数量	连续型变量(0-10)	1.46	0.74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1; 否则=0	0.49	0.50
流动时间	连续型变量(1-57) ^②	6.75	6.05
流动经历	非初次流动=1; 否则=0	0.53	0.49
住房性质	自有住房=1; 否则=0	0.31	0.46
居/暂住证	已办理居/暂住证=1; 否则=0	0.01	0.12
社保卡	已办理社保卡=1; 否则=0	0.54	0.49
医疗保险	参加任一种医疗保险=1; 否则=0	0.93	0.26
社会交往	业余时间主要和本地人来往=1; 否则=0	0.32	0.47
社会参与	连续型变量(0-6)	0.71	1.01
流入地	东部=1; 其他=0	0.44	0.49
	中部=1; 其他=0	0.22	0.42
	西部=1; 其他=0	0.34	0.47
流出地	东部=1; 其他=0	0.19	0.39
	中部=1; 其他=0	0.34	0.47
	西部=1; 其他=0	0.46	0.49

注: ①未上过小学=0; 小学=6; 初中=9; 高中/中专=12; 大专=14; 本科=16; 研究生=19; ②小于1年按1年处理

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依然在同样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系数变小。因此,就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来说,本地社会资本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

跨户籍婚姻在不同受教育水平和性别群体中的作用强度是否存在差异是本文所感兴趣的问题。表2第三、四列回归模型针对研究假设3、4进行验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别纳入“跨户籍婚姻”和“受教育水平”以及“跨户籍婚姻”和“性别”的交互项。从回归结果来看,“跨户籍婚姻”与“受教育水平”的交互

4.2 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相关变量、流动特征、社会保障因素以及区域虚拟变量后,表2第一列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跨户籍婚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户籍婚姻对于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有显著积极影响,即与当地入结婚的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符合本文预期,研究假设1得到证实。

本文以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来反映流动人口的本地社会资本,并认为这在跨户籍婚姻对其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中起到一定中介作用。表2第二列在第一列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变量,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与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相较于非本地人口,与本地人口交往的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参与本地社会活动越多则更加认同本地身份。在纳入这两个变量后,跨户籍婚姻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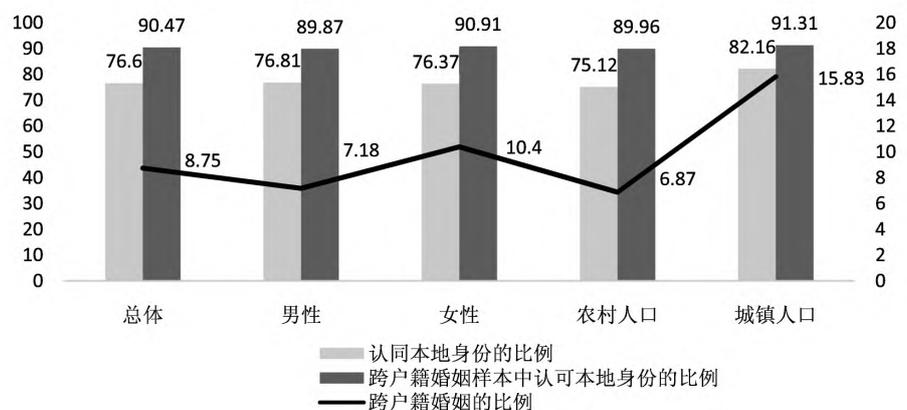


图1 总体、分性别和户籍样本跨户籍婚姻和本地身份认同情况(%)

项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受教育水平在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受教育程度越高,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正向作用则越小,假设3得到验证。受教育水平作为个体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参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增强社会交往等途径作用于个体的本地身份认同,并通过形成更加独立平等的性别观和家庭观,调节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表2第四列回归结果来看,“跨户籍婚姻”与“性别”的交互项显著同样为负,这意味着跨户籍婚姻对于流动女性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4得到验证。一方面,这可能与女性所持有的相对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有关,即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更可能依附于配偶。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流动女性在劳动参与、经济收入、社会网络构建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客观情况有关。

表2 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跨户籍婚姻(否=0)	0.636*** (0.036)	0.537*** (0.037)	0.692*** (0.043)	0.701*** (0.048)
性别(女性=0)	0.045** (0.015)	0.040** (0.015)	0.043** (0.015)	0.051** (0.015)
受教育水平	0.016*** (0.003)	0.003 (0.003)	0.018*** (0.003)	0.016*** (0.003)
年龄	0.037*** (0.007)	0.033*** (0.007)	0.037*** (0.007)	0.038*** (0.007)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户籍性质(农业=0)	0.184*** (0.020)	0.143*** (0.020)	0.186*** (0.020)	0.185*** (0.020)
健康状况(不健康=0)	0.234*** (0.052)	0.223*** (0.052)	0.232*** (0.052)	0.233*** (0.052)
工作状况(无工作=0)	-0.100*** (0.021)	-0.128*** (0.022)	-0.098*** (0.021)	-0.098*** (0.021)
子女数量	-0.054*** (0.011)	-0.043*** (0.011)	-0.053*** (0.011)	-0.054*** (0.011)
流动时间	0.019*** (0.001)	0.015*** (0.001)	0.019*** (0.001)	0.019*** (0.001)
初次流动(非初次=0)	-0.301*** (0.015)	-0.333*** (0.015)	-0.341*** (0.016)	-0.341*** (0.015)
流动范围(省内=0)	-0.398*** (0.017)	-0.357*** (0.017)	-0.397*** (0.017)	-0.398*** (0.017)
住房性质(非自有=0)	0.794*** (0.019)	0.717*** (0.019)	0.796*** (0.019)	0.793*** (0.019)
办理居/暂住证(否=0)	-0.168** (0.064)	-0.175** (0.064)	-0.167** (0.064)	-0.168** (0.064)
办理社保卡(否=0)	0.098*** (0.015)	0.073*** (0.015)	0.098*** (0.015)	0.098*** (0.015)
医疗保险(无=0)	-0.030 (0.029)	-0.041 (0.029)	-0.029 (0.029)	-0.029 (0.029)
流入地				
东部	-0.679*** (0.023)	-0.579*** (0.023)	-0.677*** (0.023)	-0.679*** (0.023)
西部	0.006 (0.026)	0.022 (0.026)	0.006 (0.026)	0.006 (0.026)
流出地				
东部	0.162*** (0.021)	0.131*** (0.021)	0.162*** (0.021)	0.162*** (0.021)
西部	-0.042* (0.019)	-0.045* (0.020)	-0.041* (0.019)	-0.042* (0.019)
社会交往(非本地人=0)		0.662*** (0.018)		
社会参与		0.090*** (0.008)		
跨户籍婚姻* 受教育水平			-0.029** (0.011)	
跨户籍婚姻* 性别				-0.151* (0.071)
常数项	2.152*** (0.069)	2.001*** (0.065)	2.136*** (0.069)	2.310*** (0.064)
伪R ²	0.084	0.096	0.085	0.085
N	120,901	120,901	120,901	120,901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表中数据为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其中,年龄、年龄的平方项、流动时间作了中心化处理。

此外,一些控制变量对于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也具有显著影响。男性相较于女性、城镇人口相较于农村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年龄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呈倒U形,随着年龄增长更有可能认同本地身份,但继而会产生负面影响,这里可能包含老年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方面所隐含的问题;受教育水平和

健康状况都与本地身份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对没有工作的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的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反而更低,这可以理解为在劳动力市场所感知到的歧视与隔阂可能不利于流动人口的融入,而没有参与工作的流动人口群体很可能是家庭随迁者或者退休人员,对于社会隔阂的感知反而相对更少;子女数量越多,越不利于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从流动特征来说,相较省内流动,跨省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更低;随着流动时间增长,更加可能实现身份认同;相对而言,初次流动的人口更可能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研究还发现,拥有自有住房和办理个人社会保障卡均对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具有积极影响,拥有住房产权有助于减少流动人口的漂泊感(徐延辉,邱啸,2017),社会保障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关键作用;办理居住/暂住证与本地身份认同显著负相关,尽管在一些城市依托居住证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但相较本地户口,居住/暂住证可能仍然给流动人口以“临时落脚”的心理体验,因此呈现出显著负相关的结果;流入地为东部地区则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更低,但来自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相比之下,来自西部的流动人口更不易实现本地身份认同。

考虑到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的差异性,即他们在流入地的生活体验、感知以及建构身份认同的情境有所不同,有必要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跨户籍婚姻的影响系数在两组样本中均显著为正,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随机扰动项方差异质性的影响,我们对模型结果计算了APE(average partial effect)系数^①。这一系数几乎不会受到与自变量无关的未观测异质性的影响,并可以进行模型间、样本间的系数比较(洪岩璧,2015)。比较可知,跨户籍婚姻对乡-城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促进作用更强。

表3 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影响的分样本回归

变量	城-城流动人口	乡-城流动人口
跨户籍婚姻(否=0)	0.600*** (0.063)	0.670*** (0.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2.758*** (0.186)	2.051*** (0.075)
伪R ²	0.098	0.078
N	25,779	95,122

注:*** p<0.001, ** p<0.01, * p<0.05;表中数据为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控制变量如前文所列。

表4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One-stage	IV
跨户籍婚姻(否=0)		2.685*** (0.149)
地区跨户籍婚姻比例	0.696*** (0.016)	
控制变量	是	是
Con_	0.091*** (0.007)	0.892**** (0.049)
F-test	957.70	
R-squared		0.137
N	120,901	120,901

注:*** p<0.001, ** p<0.01, * p<0.05;表中数据为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控制变量如前文所列。

可能有重要影响。这一变量影响流动人口的婚姻选择,但对其本地身份认同应无明显的直接影响。从表4的结果来看,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地区层面跨户籍婚姻的比例与流动人口的婚姻选择显著正相关,符合本文的预期;第二阶段回归表明跨户籍婚姻确实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有显著正面影响。可见,跨户籍婚

5 稳健性检验

尽管身份认同常用以反映更高层次的心理融入,并被认为是其他维度的社会融入存在发展脉络上的递进顺序,但由于融入过程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跨户籍婚姻和本地身份认同之间仍然存在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因此,本文选取流入地所在地区跨户籍婚姻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采用IV-probit方法尝试处理这一问题。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原因有二:一是婚姻行为可能具有群体内的示范效应,在跨户籍婚姻比例更高的空间范围内,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结婚的概率可能更大;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区域婚姻文化,比如有些地区更为盛行本地嫁娶的传统,有些地区这种传统相对较弱,而这对于流动人口跨户籍婚姻的实现

①城镇样本中跨户籍婚姻对身份认同影响的APE系数为0.071,农村样本这一系数为0.099。

姻会提高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此外,由于作用于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因素可能也同时作用于其是否选择跨户籍婚姻,即存在样本自选择的可能。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以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ATT)方法来计算处理效应。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将样本分为两组——处理组:跨户籍婚姻组,控制组:非跨户籍婚姻组;然后根据流动人口相关信息来估计样本进入跨户籍婚姻组和非跨户籍婚姻组的概率,得到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大小进行匹配;再次,将匹配好的、与跨户籍婚姻样本的倾向得分最接近的非跨户籍婚姻样本作为其反事实;最后,比较两组间身份认同的差异,再对计算出来的差异取均值,得到流动人口跨户籍婚姻对于其身份认同的平均处理效(ATT)。

本研究采用 Logit 模型获得实现跨户籍婚姻的倾向匹配得分值。具体模型如下:

$$Pr\{marriage = 1|X\} = \Phi(\beta_0 + \beta_1 Adjust + \beta_2 Control + \mu)$$

表 5 ATT 估计结果

身份认同	匹配类型	跨户籍婚姻组	非跨户籍婚姻组	ATT 值	t 值
全体样本	匹配前	0.9047	0.7527	0.152042	37.15***
	匹配后	0.9047	0.7934	0.111322	18.65***
农村样本	匹配前	0.8996	0.7402	0.1594	30.31***
	匹配后	0.8996	0.7799	0.1197	14.88***
城镇样本	匹配前	0.9131	0.8044	0.1086	17.38***
	匹配后	0.9131	0.8158	0.0973	11.23***

注:*** p<0.001, ** p<0.01, * p<0.05。

其中, *marriage* 表示跨户籍婚姻; *Adjust* 和 *Control* 分别代表前文所指出的一系列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也就是一系列可能影响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婚的特征变量,这里选取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户籍类型、流动范围、流动经历、流出地区、流入地区

域等在内的因素,由此计算出每个样本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婚的概率值。在估计出每个个体的倾向得分后,依据得分的共同支撑域(common support)来匹配处理组和控制组。本文主要采取“最近邻匹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进行匹配,同时,也分城乡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处理结果如表 5,在匹配消除了控制组和处理组样本系统性误差后,跨户籍婚姻依然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

6 结论与讨论

本地身份认同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2017 年数据为基础,按照户籍属地的异质性定义了跨户籍婚姻,考察了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婚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性别、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和本地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

- (1) 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存在积极影响,分城乡来看,这种影响在农村人口更加明显;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基本一致;
- (2) 本地社会资本在跨户籍婚姻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通过跨户籍婚姻,流动人口增加了本地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地身份认同;
- (3) 性别和人力资本对此影响具有调节作用。跨户籍婚姻对于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在女性流动人口群体中更为强烈;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跨户籍婚姻对其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越小;
- (4) 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影响,包括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住房性质、流动范围、流动时间、福利保障等因素。

在不同规模与城镇化率的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特征与困境是有区别的,这是考察跨户籍婚姻对于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影响的现实背景。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尤为突出(刘涛等, 2020)。尽管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全面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但另一方面,相较中小城市、县城,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政策因素构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巨大挑战,流动人口

面临更多社会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和隐形的文化障碍。跨户籍婚姻的意义也因此不仅仅是简单的择偶决策,而是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快速通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看到跨户籍婚姻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更应该丰富和拓展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途径,帮助他们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增强其社会融入能力,比如提供职业培训、增强继续教育、提升健康水平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为流动人口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劳动收入、更多的价值认可,以及更强的适应能力,这都有助于他们积极定位自己的本地身份。尤其在超大城市和大城市较为严苛的落户政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更是与落户条件直接挂钩。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下降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是流动人口在新的社会空间中立足、适应并融入的重要自致性因素,可以使流动人口在婚姻之外拥有更多相对独立去建构本地身份认同的机会。研究结果还表明,制定相应政策要具备性别视角和城乡视角,政策受众尤其要关注女性和农村流动人口。跨户籍婚姻的身份认同促进效应之所以在女性流动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中更为显著,除了跨户籍婚姻本身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之外(沈文捷,风笑天,2013),更可能与这部分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有关。这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市场,还体现在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等方面(Parrado & Flippen, 2005)。比如农村人口更可能面临流动带来的文化冲击和制度排斥(刘娜,2019),流动女性更可能面临原生家庭支持网络的弱化与断裂(祖群英,2014)。因此,应格外关注这部分群体在社会融入中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跨户籍婚姻对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本地社会资本的积累实现的。跨户籍婚姻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本地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在此过程中构建起本地关系网络,积累了社会资本,进而产生积极的身份定位。但在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目标导向下,不能仅仅将跨户籍婚姻看作手段,事实上跨户籍婚姻也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间社会距离缩小的重要信号(Song, 2009)。未来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促进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社会交往,强化流动人口在公共社会领域的嵌入程度。

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跨户籍婚姻究竟如何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本文提出的影响机制仍十分有限,现实情况显然会更复杂,比如跨户籍婚姻如何从家庭生活内部作用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二,结合流入和流出地相关特征,跨户籍婚姻的社会融入效应可能具有一定异质性,但受限于数据,本文未能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第三,尽管本文采取了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方法,但更好地进行因果推断还应采用追踪数据。

参考文献:

- Chow S. The significance of race in the private sphere: Asian Americans and spousal preferences [J]. *Sociological Inquiry*, 2000, 70 (1): 1-29.
- Felicia F. Tian, Yue Qian & Zhen chao Qian. Hukou Locality and Inter-marriages in Two Chinese Citi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18, (56): 12-20.
- Gord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Hogg Michael A., Christie Meehan., & Jayne Farquharson. The Solace of Radicalism: Self - Uncertain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in the Face of Threat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0, 46(06): 1061-1066.
- Koelet S., Mol. C. V. & De Valk, H. A. G. Social embeddedness in a harmonized Europe: The social networks of European migrants with a native partner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J]. *Global Networks*, 2017, 17(3): 441-459.
- Song M. Is Inter-marriage a Good Indicator of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9, 35(2): 331-348.
- Passel J, Taylor P.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and their U. S. - born children [M]. Rep. Pew Hisp. Cent., Washington DC, 2010.
- Parrado E. A. & C. Flippen. Migration and Gender among Mexican Wome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 606-632.
- Ryan J. & Mulholland J. 'Wives Are the Route to Social Life': An Analysis of Family Life and Networking amongst Highly Skilled

- Migrants in London[J]. *Sociology* 2014 48(2): 251 – 267.
- Song M. The diversity of the mixed race population in Britain[A]. in Sims J. (ed.) *Mixed Heritage: Identity Polic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unnymede Trust 2007.
- Uzi Rebhun .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Milton Gordon's Multi – dimensional Theory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2015 30(5): 473 – 496.
- Wang Q. ,Ren T. ,& Liu T. Training ,skill – upgrading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s: Evidence from China [J]. *Urban Studies* , 2018 56(13): 2779 – 2801.
- 蔡禾 曹志刚.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 148 – 158.
- 邓睿. 身份的就业效应——“城市人”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经验考察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 (5): 91 – 103.
- 杜鹏 丁志宏 李兵 周福林. 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 [J]. *人口研究* 2005 (4): 53 – 61.
- 高颖 张秀兰. 大城市“两地婚姻”的变动趋势及特征分析——以北京为例 [J]. *南方人口* 2014 (2): 1 – 10.
- 卢晖临 潘毅.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J]. *社会* 2014 (4): 1 – 24.
- 洪岩璧. Logistic 模型的系数比较问题及解决策略: 一个综述 [J]. *社会* 2015 (4): 220 – 241.
- 靳小怡 张露 杨婷.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民工的“跨户籍婚姻”研究——基于深圳 P 区的调查发现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 (1): 31 – 38.
- 景晓芬 李松柏.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 148 – 153.
- 凯特·米莉特. 性的政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李斌 张贵生. 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 [J]. *社会学研究* 2019 (3): 146 – 169.
- 李强 何龙斌. 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的融入影响研究——兼论就业的中介作用 [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 (5): 147 – 151.
- 李树茁 任义科 靳小怡.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08 , (2): 1 – 8.
- 刘爱玉 佟新 付伟.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 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J]. *社会* 2015 (2): 109 – 136.
- 刘娜. 断裂型社会排斥: 农民工社会福祉融入的制度、区域与阶层困境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 (4): 80 – 84.
- 刘涛 韦长传 仝德. 人力资本、社会支持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以北京市为例 [J]. *人口与发展* 2020 (2): 11 – 21.
- 罗俊峰 童玉芬. 流动人口就业者工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2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J]. *经济经纬* 2015 (1): 131 – 136.
- 邱幼云. 农村 – 城镇流动与青年妇女增能——以夫妻性别关系为例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7 (4): 52 – 58.
- 任远 陶力. 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J]. *人口研究* 2012 (5): 47 – 57.
- 沈文捷 风笑天. 城里的农村媳妇: 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2): 84 – 90.
- 史毅. 户籍制度与家庭团聚——流动人口流入地的身份认同 [J]. *青年研究* 2016 (6): 11 – 20.
- 谭琳 苏珊·萧特 刘惠. 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3 (2): 75 – 83.
- 王春超 张呈磊.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 [J]. *社会学研究* 2017 (2): 199 – 224.
- 王桂新、武俊奎.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J]. *社会学研究* 2011 (2): 28 – 47.
- 吴际 尹海洁 曲鹏. 流动人口社会参与度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子检验 [J]. *统计与决策* 2017 (3): 116 – 120.
- 韦艳 吴莉莉 张艳平.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生活福利研究 [J]. *青年研究* 2014 (6): 81 – 90.
- 韦艳 蔡文祯. 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 基于婚姻匹配的认识 [J]. *人口研究* 2014 (4): 75 – 86.
- 向华丽. 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 3 市的调查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1): 103 – 110.
- 许琪 熊略宏. 本人还是配偶? 谁决定中国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12): 12 – 20.
- 徐延辉 邱啸.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11): 127 – 136.
- 杨华. 作为变革者: 农村青年女性的依附性身份与外人气质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 (5): 60 – 69.
- 杨菊华 张莹 陈志光.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 [J]. *人口与经济* 2013 (3): 43 – 52.

(下转第 41 页)

